

執政的道德困境與突圍之道

——「三反五反」運動解析

• 張 鳴

「三反五反」，是中共建國之初發動的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性政治運動。所謂「三反」，是指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主要在中共黨、政、軍機關展開，在現象上有點類似於今天的反腐敗，但實際上有很大差異。所謂「五反」，是指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主要針對私營工商業者，制裁他們在生產經營中、尤其是在為國家的加工訂貨中的「違法行為」。這些行為，有點類似於今天我們所說的「權力尋租」。這場運動，對中國當代歷史的走向有重要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講，「三反五反」運動是繼中共立國的三大運動（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之後，最重要的、意在解決執政問題的一場政治操作，這場運動的價值，在於中共自行暴露了中國原有的市場經濟跟統制型政治架構的矛盾，使得這一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就存在的問題，以極端的方式展露在世人面前。中共對此問題的結構性根本解決，只能是加快社會主義的步伐，消滅市場經濟。自運動以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就脫離原來的計劃，進入了快車道。然而，迄今為止，正統的中共黨史視野的研究，基本上視之為中共的自我廉政運動和對社會舊道德的改造。海外的研究，有的雖然意識到了這場運動對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影響，但卻只說「五反」，不提「三反」，忽略了運動跟中共執政權力狀況的關聯，依然沒能很好地揭示出這場運動的本質^①。

在中央奪取政權之後，私營資本的權力尋租和國家統制對市場經濟的戕害等問題很快就暴露了出來。「三反五反」運動，可以說就是中共對這個問題的應對。這場運動的價值，在於中共自行暴露了中國原有的市場經濟跟統制型政治架構的矛盾。但正統的中共黨史研究，基本上視之為中共的自我廉政運動和對社會舊道德的改造。

自延安整風以來，群眾政治運動已經成為中共政治操作的一種特別方式，在很多關鍵的歷史關頭，屢試不爽，效用非凡，經常能起到日常手段所無法企及的作用。中共建國後意識到由於國家的極度貧弱，必須允許私人資本的存在與發展，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維持市場經濟的地位，但政權的模式卻跟前蘇聯看齊，堅持黨的一元化，並逐步走向集權和統制化。同時，中共還刻意保持自身革命黨的道德主義傳統，至少中共的最高領導層，對於進城之後因生活安逸而導致道德意志退化，即所謂李自成問題的產生，也有相當的警惕。但是，在奪取政權之後，中共的地位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何解決取得政權以後，黨的一元化領導的集權體制跟私營資本、市場經濟關係的問題很快就浮現出來，

直接威脅到革命黨道德原色的維持。類似的問題，實際上在國民黨政權的後期就已經存在了，並且是導致國民黨政權腐敗及這個政權跟民族資本發展矛盾衝突的重要原因。中共奪取政權之初所建立的政權，是黨政一體帶有軍事化色彩的集權體制，比國民黨政權更缺乏制衡和監督，對經濟活動的干預程度，國家資本主義的規模，也不讓於當年處於戰爭體制的國民黨政權，所以，私營資本的權力尋租和國家統制對市場經濟的戕害等問題很快就暴露了出來。「三反五反」運動，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就是中共對這個問題的應對。

一 運動的緣起和經過

「三反五反」運動，是由「三反」開始的。據許蕾的研究，發動「三反」運動的最初動機是由於朝鮮戰爭導致的財政困難，由財政困難而增產節約，由增產節約而反貪污浪費，而貪污浪費有很多是由於官僚主義引起的，所以，增產節約演變成了「三反」。運動起源地在東北，顯然是跟東北作為戰爭的直接後方有關。劉青山、張子善事件的發生，使得毛澤東改變想法，使其注意到中共自身的廉潔問題，運動具有了整黨的意義^②。這種觀點無疑是有道理的，在運動開展前，我們看到，不僅中共領導人在講話中多次強調增產節約，精簡機構，解決財政困難，而且中共中央特別作出決議，緊縮軍隊，節約增產，藉以克服財經困難。在戰爭尚在進行的情況下，就着手進行軍隊復員和精簡工作^③。不過，在筆者看來，這種論點應該稍加修正，事實上，在劉青山、張子善事件發生前，陸續揭露出來的黨內貪污現象，已經觸動了毛澤東那根相當敏感的神經。進城之後，黨內的貪污腐化和官僚主義現象，尤其是體現在黨內領導幹部身上的種種劣迹，事實上引發了毛的一種很深邃的擔憂，即擔心重蹈李自成覆轍。這種擔憂，早在延安時期，在毛的心目中就已經形成了，而在建國前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特地以黨的決議形式，將之充分表達出來。若轉化成階級鬥爭的話語，李自成覆轍則變成了共產黨人如何避免被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打中的問題。在進城前後，黨內流行的話題之一，就是跟李自成覆轍有關的「反對劉宗敏思想」。在劉青山、張子善事件暴露前，「三反」運動開展的第十天，西北局給毛的一份報告裏就已經提到貪污問題，「說明黨內享樂腐化思想確實增長起來，貪污蛻化已成為主要危險。」毛轉發這個報告，並表示同意^④。接着，毛澤東在西南局的一份報告上批道^⑤：

中共進城之後，黨內的貪污腐化和官僚主義現象，尤其黨內領導幹部的種種劣迹，引發了毛澤東對重蹈李自成覆轍的擔憂。這種擔憂，早在延安時期，已在毛的心中形成。在進城前後，黨內流行的話題之一，就是跟李自成覆轍有關的「反對劉宗敏思想」。

自從東北局揭露大批的貪污犯以後，我們已告訴你們嚴重地注意此事。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着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並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務請你們加以注意。

接下來，毛澤東又在1951年12月1日印發〈中共中央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上，刻意強調了七屆二中全會

所提出的防止資產階級腐蝕的問題，認為這種腐蝕具有必然性和巨大的危險，而且現在是到了全黨動員，切實執行二中全會決議的「緊要時機了」^⑥。毛澤東很清醒地意識到，對於中共這個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黨來說，如何避免李自成的覆轍，的確是個生死攸關的問題，而大量貪污現象的出現，顯然是印證了他進城前的擔憂。不過，通過運動解決因戰爭導致的財政問題的考慮，並沒有因而消退，在運動中，毛澤東對軍隊的「三反」抓得尤其緊，似有直接節約軍費的效果。在已經公開的毛澤東有關「三反」運動的批示中，大約有三分之一左右是針對軍隊的。「五反」運動中要資本家超量的退補，本身也多少含有當年打土豪的影子^⑦。這說明上述兩個動因一直是並行不悖的，即既要通過運動解決財政問題，同時實現黨內的道德整肅。所以，「三反」作為自上而下發動的群眾運動，不僅是緩解經濟困難的槓桿，也是解決執政黨自身難局的手段。

「三反五反」運動，實際上分兩個階段，一是「三反」時期，從1951年11月1日，毛澤東轉發東北局的報告，要求在全黨開展「三反」運動起，到1952年2月中旬告一段落，此階段主要是「三反」，鬥爭對象主要在黨和軍隊政府機關內部。二是「五反」時期，從1952年1月26日毛澤東布置在全國大中城市「五反」開始，至1952年5月初，「五反」運動基本結束，此階段以「五反」為主，主要是「反擊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

運動的兩個階段都是初起時來勢凶猛，很快就達到高潮，退潮也很快。毛澤東作為運動的發動和推動者，不斷地利用轉發報告（形成各地攀比的局面）、嚴詞督責和直接干預等方式加壓，促使運動升溫。據當時作為運動的領導機構的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負責人薄一波回憶，毛澤東幾乎每天晚上都要聽取他的彙報，「甚至經常坐鎮中節委，參加辦公會議，親自指點。」^⑧薄一波還特別提到，1951年12月30日毛接到中南軍區的電報後，覺得他們的動作稍緩，「即於元旦凌晨兩點起草覆電，要求他們對運動要『嚴加督促，勤加指導，務使每天都有收穫』，並對來電不妥之處作了修改，派專人連夜乘專機將修改稿送到，以引起中南軍區的高度重視。」^⑨在「三反」初期即決定殺掉兩個高級幹部劉青山、張子善，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為了促進運動的迅速升溫（兩人最大的罪名其實是挪用公款，挪用的目的實際上是為了「機關生產」，而那個時代，機關生產是相當普遍而且是半合法的。由於原來根據地山頭的原因，各個山頭都要各顯神通搞生產，否則就要受窮，這個傳統進了城之後當然不會很快消失，所以殺掉他們，理由其實並不充分）^⑩。但隨着運動走向高潮，打擊面過廣，不僅引起了黨內的不滿和反彈（凡是沾上經濟和財務邊的事情就沒有人做了），而且直接影響了所有跟國家機關有關的經濟活動，導致生產下降，失業增加，使財政狀況更加惡化。於是運動開始轉向，重心由「三反」變成「五反」，實際上是換了鬥爭的目標，將矛頭轉向了資產階級工商業者。然而，在第二階段，各大城市依然按「三反」的模式進行運動，毛澤東還是從上面加溫督促，運動走向高潮的結果比「三反」更糟，市場蕭條，經濟下滑，失業驟增，甚至影響到了部分地區1952年的春耕。結果，運動不得不草草收兵。運動結束的時候，實際處理的狀況，不僅跟運動初期定的指標相去甚遠，跟運動中抓出的「大老虎」數量也有一定的差距，絕大部分鬥爭對象都被放過了。

在「三反」初期即決定殺掉兩個高級幹部劉青山、張子善，可以說是為了促進運動的迅速升溫。後來運動開始轉向，重心變成「五反」，矛頭指向了資產階級工商業者。然而，運動走向高潮的結果比「三反」更糟，市場蕭條，經濟下滑，失業驟增，甚至影響到了部分地區1952年的春耕生產。結果，運動不得不草草收兵。

二 道德主義與群眾運動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共作為革命黨所具有的革命精神，是它能夠戰勝國民黨的本錢。所謂革命精神的主要成分，其實是帶有禁欲主義內涵的道德主義，這種本錢，在艱苦的戰爭條件下，由於跟中國農民樸實的道德文化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相對容易保持，但進城之後，這種樸實的道德不僅要經過城市浮華生活的考驗，而且更面臨着私營經濟的衝擊，大有動搖之勢。資本家對權力的依附和收買，本來是出於經濟效益考量而生出的必然結果，但卻被中共看成是對他們的一種致命的道德腐蝕，甚至是對新生政權的威脅。解決問題的思路，只能是一手道德整肅和道德修復，一手打擊道德腐蝕的源頭。所以，這場運動表現出強烈的道德整肅傾向，運動的組織發動者，從頭至尾都是在刻意營造某種道德批判的氣氛，這種氣氛，既是動員的需要，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運動的目的。跟此前開展的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稍有不同，「三反五反」運動的道德批判雖然背後也有階級鬥爭的道理，但至少表面上不需要建構獨特的革命道德話語。在中共的官方話語裏，「三反五反」是一場「為着清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①。無論是「三反」所反的「三害」（貪污、浪費、官僚主義）還是「五反」所反的「五毒」（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經濟情報），從字面上講，都屬於任何社會都會加以鄙視的失德和犯罪行為。在任何時候和場合，對這樣的行為進行譴責批判甚至懲處，在一般民眾眼裏，都具有充分的合法性。由於運動獲得了部分來自傳統的資源的支持，不僅便於動員群眾，而且使鬥爭對象在道義上喪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只能任憑處置。在整個運動期間，雖然鬥爭對象自殺、甚至全家自殺的事件在各地都有所聞，但沒有聽說過任何一次反抗行為，運動過程中被冤枉的人成千上萬，但幾乎沒有人想過反抗，這一點，跟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是不一樣的。

不過，儘管運動的道德批判具有普遍主義的意味，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在普世道德的背後，運動話語依然被賦予了階級鬥爭的意義。像「三反」這樣的運動，至少在開始的時候，說它是階級鬥爭還有點牽強，而「五反」運動的開展，則不僅順利地將「三反」納入了階級鬥爭的軌道，而且填充了「剝奪剝奪者」的火藥味。在經過「解放」的一般下層民眾眼裏，所謂的階級鬥爭，就是鬥富人，均貧富。所以，運動在實質上仍然跟土地改革一樣，具有強度追求社會公正，向「剝奪者」開刀的別種道德內涵。在「三反」運動中，鬥爭對象是那些掌握權力的大小官員，而「五反」的對象則是「為富不仁」的資本家。無疑，這種具有鬥爭性的道德訴求，對於一般民眾、一般學生和機關幹部來說，很具有吸引力，比較容易挑起人們那根敏感的神經。在「三反」運動中，沒有權力的一般職員、幹部和學生往往比較興奮，樂於參加運動，而負責幹部在開始時往往不積極，在高壓下不得已開展運動之後，也往往憑藉領導運動的地位，盡可能利用權力技術操控運動的走向。至於「五反」運動，則更是工人和店員們的節日。開會、鬥爭，工人不上班，工資卻拿最多的，有的地方甚至要求平分資本家的財產。據李新回憶，中國人民大學在「三反」運動伊始，學生就很興奮，一下子貼了校領導許多大字報，群情激奮，不可遏止，同時，校領導層的關係也開始惡化，最後不得不有勞中央出面協調，被迫對學校主要領導進行調整，才算把局面控制住^②。

「三反」運動的鬥爭對象是那些掌握權力的大小官員，而「五反」的對象則是「為富不仁」的資本家。這種具有鬥爭性的道德訴求，在一般民眾眼裏，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在整個運動期間，雖然鬥爭對象自殺在各地都有所聞，但沒有聽說過任何一次反抗行為，這一點，跟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不一樣。

公安部每天開會開到大半夜，「有的單位群眾自動要求通宵開會，群情激奮，空氣緊張……火力十分旺盛，出現了公安部機關成立以來未曾有過的熱烈的群眾運動。」^⑬東北出現了所謂「極端民主化傾向」，高級幹部用公家的錢買參考書，也被說成是貪污，大連工學院要求驅逐校長，有的單位群眾把「三反」理解為「整領導」、「整共產黨」的運動。甚至認為，除了毛主席，沒有手腳乾淨的^⑭。有的農村，農民聽到消息後自發進行運動，準備批鬥村幹部^⑮。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頗具規模的群眾自發上街請願和遊行示威。

在這種道德氛圍裏，「三反」實際上變成了「一反」，即捉老虎（貪污犯），因為只有貪污才最能激起人們的義憤。「五反」則變成了「六反」、「七反」，上海、天津、濟南、南京等地甚至提出「反暴利」的口號，「以算剝削賬的辦法去算暴利」，不僅資本家的任何一點不軌和劣迹都可以成為被鬥爭的理由，甚至他們的正常經營也一樣可以被清算^⑯。而且在運動中，人們特別熱衷的事情，其實是追贓和退補，即讓貪污的官員和資本家受損失，甚至讓他們傾家蕩產。所以，運動所調動起來的人們的情緒，實際上跟土改有點類似，都是對佔了便宜和得着利益的人們的某種嫉恨。「五反」運動中的「反暴利」口號的提出，特別有象徵性，等於是說，資本家之所以被整，其實是因為他們的「暴利」，而對「暴利」的界定實際上是非常難的，真的實行起來，就可能像土改運動一樣，只要有點利潤，甚至只要你比別人過得好一點，就被視同為有「暴利」。但是，在運動中，只有這種嫉恨才具有殺傷力，可以使運動火爆起來。

在「三反」運動中，人們特別熱衷的事情，其實是追贓和退補，即讓貪污的官員和資本家受損失，甚至讓他們傾家蕩產。運動所調動起來的人們的情緒，都是對佔了便宜和得着利益的人們的某種嫉恨。「五反」運動中的「反暴利」口號的提出，特別有象徵性，資本家只要有點利潤，就被視同為有「暴利」。在運動中，只有這種嫉恨才具有殺傷力，可以使運動火爆起來。

運動被發動起來的標誌就是出現了劇場效應，參與者在其中「聯歡」。但是，如果想要實現這種「聯歡」，除了賦予運動合法性的道德主義之外，還需要領袖給予他們非常態行為的特許才行。我們看到，這種特許在運動中是存在的。為使運動快一點火起來，毛澤東曾經提出過「大膽懷疑」的方針^⑰，他所特別推崇的解放軍六十六軍的典型經驗裏，指導思想就是「大膽懷疑，追加預算」的八字方針^⑱。在「三反」中，要求各級幹部「人人下水洗澡」^⑲，對「五反」的打擊面也是唯恐不寬。1952年1月14日，解放軍總政治部針對西南軍區的一份運動簡報有個避免鬥爭擴大化的批示，由於簡報裏說，有的單位幾乎百分之百的人員有大小不同的貪污行為，因此總政要求避免把一般性的公私不分都說成是貪污。但毛澤東看後認為這個批示不妥，在他看來，當時運動的「偏向」是右，而不是左^⑳。據不完全統計，1951年12月一個月內，毛澤東有關「三反」的批示和按語，提到「大張旗鼓」四字凡八次，有的地方在「大張旗鼓」後面還要加上「雷厲風行」字樣，可見其非把群眾發動起來不可，將運動搞得火爆起來的決心。

不過，被動員起來的群眾熱情容易導致運動的失控，甚至威脅到現存的政治秩序。在「三反」運動中，發動的時候需要黨和政府的組織系統，然而發動起來之後，運動的運轉卻容易把矛頭指向運動的發動者，從而使得局面出現失控。為了避免運動中出現人民大學那種混亂情況，自劉青山、張子善之後，各單位的主要領導一般都由於某種來自上面的默許，處於運動的領導位置，從而避免被當成老虎來打，儘管他們未必「乾淨」。雖然運動的主導者毛澤東未必對黨政軍各級系統的主要領導有多少偏愛，但對運動失控的擔心，卻使得在客觀情勢上不能真正放手「打老虎」，甚至有時不得不同意給予過去革命有功勞的人以罪過減免^㉑。據薄一波回憶，中節委在運動中也曾接到過針對高崗的檢舉信，

說他也派人查了，但顯然不可能有結果^②。儘管高崗的腐化當時在黨內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但在一場以反腐敗為名的運動中，卻根本觸動不了他一根毫毛，顯然是由於他特殊的地位所致。從這個意義上說，運動後期重心從「三反」轉為「五反」，雖說是「抓住了資產階級的小辮子」，為黨內的腐敗找到了真凶，但其實也不乏為自己人開脫的意思。同樣，在「五反」運動中，工人群眾當然希望多打大和超大級別的老虎，但由於有改善財政狀況的初衷，從穩定市場的角度，那些頂級的大資本家事實上是不能真的打倒的，所以在運動後期，愈是大資本家處理就愈輕，上海給榮毅仁等幾十個大資本家評為基本守法戶之後，毛澤東說：「何必那麼小氣？再大方一點，劃成完全守法戶。」^③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運動就是為了打老虎，實際上在運動的本來意義上，可以說卻只拍蒼蠅，不打老虎。

「三反五反」運動始終都存在着群眾運動的內在趨向和現實政治經濟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被煽惑起來的道德主義的情緒，實際上是雙刃劍，既可能修補體系的道德，也可能傷及體系，甚至導致體系的損毀。愈是具有道德氛圍的群眾，破壞力就愈大，激憤的人們往往不會局限在某個特定的軌道，道德的要求也會水漲船高，直到令人窒息，群眾運動特有的反權威反秩序特質，在這種窒息的氣氛中，會產生爆發性的效果。由於「三反五反」運動觸及到中共的黨政軍領導機構，反權威的特質表現得特別明顯。

在「五反」運動中，由於有改善財政狀況的初衷，從穩定市場的角度，那些頂級的大資本家事實上是不能真的打倒的，愈是大資本家處理就愈輕，上海給榮毅仁等幾十個大資本家評為基本守法戶之後，毛澤東說：「何必那麼小氣？再大方一點，劃成完全守法戶。」

三 壓力操作與運動技術

嚴格意義上講，中共所有的群眾運動都是自上而下的，群眾的參與和熱情基本上是動員出來的。因此，自上而下的壓力是必需的。「三反五反」運動可以說是中共利用黨的一元化權力體系，憑藉中共的組織系統，實施壓力操作的一個典型範例。

在建國以後的中共歷史上，凡規模大一點的運動，基本上都體現了毛澤東的意圖，而且往往是毛親自推動的，「三反五反」運動也不例外。毛澤東推動運動、施加壓力的方式，有一般的行政命令，運用權力槓桿，對於不服從、不主動的下級官員，動輒以扣帽子、動搖地位來威脅，認為凡是不積極推動運動的人，本身就是官僚主義，要求先打「思想老虎」，甚至在一份提到本單位有對運動採取自由主義態度的人的報告中批覆，要求補報這些人姓甚名誰，要求給這些人一個限期，如果還不改正，予以撤職嚴辦^④。但據目前的資料看來，毛澤東主要還是利用批轉下面報告的形式加壓。毛澤東總是在各地關於運動的彙報中，選擇那些跟自己意圖接近的，加上按語和批語，轉發全國各地和各個單位，利用各地各單位領導人相互攀比和爭寵的心理，讓他們比着做起來。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毛往往選擇那些響應號召比較積極，動作快也難免有些冒進的報告，批轉下去，一步步促使運動升溫。他會不斷地將抓出的「老虎」比例比較高的報告批轉下去，明白地表示讚許。而且，在一段時間內，只要有新的「捕虎」紀錄被刷新，那麼這些紀錄就會一次次地被毛批轉下去，直到毛覺得溫度已夠。毛甚至還要求各大軍區發每周運動簡報，「互相比賽戰鬥成績，由中央加以評判。」^⑤

有的時候，毛會選擇那些在運動中表現比較合心意的報告，批轉給某些同類的其他單位，借機表達他對這些單位的不滿和責難，比如把志願軍第十九兵團的報告批給志願軍黨委，說這個報告重視抓貪污犯，而志願軍的其他單位還只是反浪費和官僚主義，「而沒有着重反貪污」^⑳。比如，毛在1952年1月9日批轉甘肅省委關於「三反」鬥爭的報告時，表達的是別的地方抓老虎太少，報告不真實甚至有欺瞞的不滿^㉑。還有的時候，批轉報告是為了推廣某些新的經驗和方法，比如批轉李富春中財委關於打虎必須算賬的經驗^㉒；推廣濟南「五反」舉辦「勞資見面會」（鬥爭資本家）的經驗^㉓；推廣天津十一區「五反」運動中，利用矛盾分化資本家的經驗，認為「這是天津同志的有益創造」^㉔，以及推廣六十六軍的打虎典型經驗等等^㉕。在運動高潮的時候，幾乎每隔幾天就會介紹推廣一個「典型經驗」。

毛澤東的另一種加壓的方式是規定和追加指標法，將運動的鬥爭對象預先劃出比例，做出「預算」，而且不斷地追加比例數字，以求運動不斷升溫。我們看到，在「三反」運動初期，各地各單位的「老虎」數字不斷地被刷新，指標節節升高。毛澤東甚至認為，在某些單位，比如軍隊的後勤機關，貪污份子的比例達到34%「是合乎事實的」^㉖。

在這種壓力的推動之下，底下沒有不動的道理。運動迅速升溫，各地各單位為了更好地表現，或者完成任務，在技術操作方面往往花樣翻新，充分發揮了「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這些具有「首創精神」的方法和技術，經過中央的及時推廣，極大地刺激了運動的熱化。

有的技術屬於曾經用過的，比如，「五反」時為動員工人檢舉揭發企業主，發動工人開展訴苦活動，派工作隊（打虎隊）進駐重點單位的方式（有的地方直接將土改工作隊改成打虎隊），都是土改時的招數。還比如，「三反」期間開大會，動員被檢舉的人員上台坦白，痛哭流涕，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而主持者對坦白的人予以表揚，插紅旗，戴花。這是延安整風搶救運動場景的重演。還有，所謂面對面和背靠背的檢舉揭發，也是延安整風中最常用的招數。甚至，在這個看起來很道德主義的運動中，過去在土改中用過的物質獎勵「激勵法」，比如獎勵運動積極份子浮財，也再次以另一種形式出現。上海市在「五反」中有這樣一項規定，說是「鑑於過去某些不法資本家為了便於達到自己行賄、暴利、盜竊、偷漏等目的，常以小恩小惠施之於店員、職員、工人（如分肥、入股份、額外津貼、多分紅利等），或曾利用店員、職員、工人之手去進行非法行動，故只要店員、職員、工人們積極檢舉不法資本家的非法行為，政府保證這些已歸店員、職員、工人的利益，一律歸自己所有，也不做任何追究與處分」^㉗。

有的方法和技術則是從軍事學的戰術那裏直接扒下來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六十六軍典型經驗，其中打虎「攻堅戰」的戰術是：「1、反覆講政策，動搖敵心；2、大會壓、小會擠，結合幹部談話，內外夾攻，八方圍殲；3、調虎離山，放虎歸山，打破共同防線；4、『勇敢加技術』，打要害，打弱點，利用矛盾，各個擊破，乘勝深追猛追，直至奪取核心工事。」^㉘嚴格說來，這些招數在此前的運動中、尤其是延安整風中也使用過，但是這樣用規範化軍事術語將之整理出來，還算是此次運動的一個特色。由於是直接套用「對敵鬥爭」的戰爭用語，所以，我們在其中已經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陰謀詭計的成分（比如「調虎離山」、「放虎歸山」）。在這些類似軍事學的戰術應用的背後，是大量的逼供行為，普遍的

在「三反」運動初期，各地各單位的「老虎」數字不斷地被刷新，指標節節升高。毛澤東甚至認為，在某些單位，比如軍隊的後勤機關，貪污份子的比例達到34%「是合乎事實的」。在這種壓力的推動之下，運動迅速升溫，各地各單位為了完成任務，充分發揮了「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這些具有「首創精神」的方法和技術，也是延安整風中最常用的招數。

肉刑和變相肉刑^⑥。最常見的逼供方式是車輪戰，一位當年的打虎隊員回憶道：「我們當時還有一個戰術叫做『磨盤戰術』，意思就是說，我們組織很多人來攻擊一個人，當時我們都是年輕力壯二十多歲的小夥子，大家輪番對這個人審問，不讓他睡覺，非得讓他說出貪污了錢不可，記得有一回一個人被我們逼得竟說自己貪污了兩火車皮的黃金。」^⑦運動中這種技術的應用主要體現在各種審查、審訊和關押上，也體現在各種鬥爭會和圍剿大會上。「五反」的鬥爭會名稱比較文雅，叫做「勞資見面會」，即工人、店員鬥爭資本家的會（這種方式，被毛澤東讚揚為「成熟的領導藝術」），在各地勞資見面會上都出現過肉刑或者變相肉刑的情況，至少是以一種非常難受的姿勢接受鬥爭。比如南京「五反」時，資本家在會上坦白時，「兩手不許捧底稿，一定要把稿子放在桌子上，兩手垂直，兩腳靠攏，眼睛向下，頭低垂。」^⑧蘇北直屬機關在總結「三反」「攻堅戰」的經驗時認為，套用整風三查的老經驗，靠講清政策，啟發自覺，群眾壓力，鼓勵坦白，對於那些較大的貪污份子或者已經變質蜕化的份子，「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結果是「放了空炮」^⑨。所以，不採取這種戰爭手段，是根本完不成運動任務的。

很富有創意的運動技術，是發動鬥爭對象身邊的人從內部瓦解攻擊，以及利用老虎之間的矛盾的「以虎攻虎」戰術。

於前者，打虎隊不僅動員懷疑為老虎的人周圍一切熟人、朋友，甚至將工作做到他們的家裏，動員他們的親戚、家人甚至妻子父母對他們施加壓力，或者直接檢舉揭發。南京的「五反」，資本家在廠裏開會受工作隊的壓力，回到家裏，「『白天母親勸，兒子唱，夜裏睡在牀上老婆又督促坦白』，左右鄰居又問：『你坦白了沒有？』」客觀上使他們沒有任何一個角落可以避風躲雨^⑩。事實上，只有在那個年代的中國，也只有中共，才可以做到瓦解鬥爭對象的朋友親屬甚至家庭的聯繫紐帶，將鬥爭開展到作為中國人最後堡壘的家庭裏去。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共的意識形態具有強大的說服力，對社會、家庭有着強烈的滲透作用，在這種滲透面前，傳統的家族倫理和親情往往顯得蒼白無力。另一方面，新中國所體現的事業具有強烈的誘惑，往往是那些鬥爭對象的親戚和家人所無法抵禦的，特別是那些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小知識份子，他們強烈的理想主義情懷，使得自身要求進步的需求很快就壓倒了殘存的一絲倫理和親情，即使沒有人特別做工作，他們做出檢舉揭發自己父母的事情也並不奇怪。

至於後者，當時被稱為挑唆「狗咬狗」的戰術，屬於「三反五反」運動中特別有效的一種運動技術。無論「三反」還是「五反」，只要把鬥爭對象放在一起開會，讓他們互相揭發，很快他們就會打起來。因為事實上形成了一種態勢，讓這些鬥爭對象以為只要主動揭發，就可以減輕自己的罪過，所以，很多人都想通過把別人拉下去來救自己。在具體的開會過程中，只要有一個人開了頭動起來，那麼很快就會「咬」成一團，大家心理都是一樣：你不讓我好過，那你也別想好。這種會，如果特意將某些相互有過節的人安排在一起，效果就更明顯。受到毛澤東點名讚揚的天津十一區，在這方面特別有心得。他們的做法是，一是許諾減輕處分，爭取一部分資本家「起義」，在交代完自己的問題之後，讓他們「向頑固的資本家進攻」。二是按行業召開資本家訓練班，讓他們在會上互相檢舉揭發，「以便利用同業矛盾，一撕破臉皮即把老底全部端出。」「有的資本家說：『咱們奸商也得要講點良心呀！我偷，你們真不偷嗎？』」於是大家就互相咬

打虎隊動員懷疑為老虎的人的親戚、家人甚至妻子父母對他們施加壓力，或者直接檢舉揭發。南京的「五反」，資本家在廠裏開會受工作隊的壓力，回到家裏，「『白天母親勸，兒子唱，夜裏睡在牀上老婆又督促坦白』，左右鄰居又問：『你坦白了沒有？』」客觀上使他們沒有任何一個角落可以避風躲雨。

起來。主持運動的人乾脆就將這種會稱之為「咬狗會」。這種會有的時候只派一個派出所長在那裏，「資本家就互相鬥起來」^{④①}，特別有效率。

我們由此看到，即使是一個以道德主義為追求的運動，在進入技術層面的時候，也一樣毫不猶豫地走向了非道德選擇。運動就是目的，運動就是一切，手段是可以不計較的，可以做出非常極端甚至突破社會道德底線的選擇。

四 運動的後果與解決困境的出路

毛澤東是個具有濃厚詩人氣質的政治家，凡是他所發起和操作的運動，從來不擔心過火，甚至生怕不過火，總是力圖把火燒得愈旺愈好，對他來說，矯妄過正是一種事物的必然。他所估計的「敵情」，往往都是憑自己的主觀臆測，並沒有多少客觀的依據。在「三反」中，比如他斷定「一個分區，一個軍，一個小市，一個縣，必定有大批的貪污犯，這是決然無疑的」^{④②}，說得這麼肯定，有根據嗎？沒有。過了頭，整錯了人，運動收尾的時候再糾正就是，箇中的邏輯跟他在中央蘇區打AB團肅反時一樣：為了黨的事業，需要有人做出犧牲。如果整錯了人，就當對他的一次考驗。如果被整的是剝削階級中人，那麼無論具體事情上的對錯，都是罪有應得。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加上打虎的預算，追加指標的加壓手段的催化，運動從開始就在過火的程度上運行，直到收尾時的糾偏，實際上還是有點「左」，被定罪的人中，有相當部分不是被冤枉的，就是罪與罰不相稱。據薄一波統計，全國縣以上黨政機關（不包括軍隊）參加「三反」的總人數383萬多人，經核實的貪污一千萬元（舊幣）以上的有十萬人，佔參加運動的總人數的2.7%^{④③}。鑑於當時軍隊參加運動的比例相當大，連處於戰爭狀態的志願軍都不能幸免，所以，如果加上軍隊的數字，估計所查出的貪污犯要增加一倍左右。關鍵是，這個數字是運動結束時複查定的，而在運動中，遭受衝擊的人要比這個數字至少多幾十倍。西南軍區後勤部門，有的單位上報的「老虎」數是百分之百，西南局參加運動的機關工作人員27萬多人，自動坦白和被人檢舉的貪污份子達12.4萬多人，佔總人數的45%^{④④}，其他地區「老虎」高達三至四成的單位比比皆是。經濟落後的蘇北地區僅僅十天，就查出貪污份子1,557人，佔全體參加「三反」學習的人數22%，其中貪污一千萬元以上的僅2人，一百萬元以下的1,459人^{④⑤}。就是說，真正稱得上是貪污犯的，僅佔打出的「老虎」中的千分之一強。事實上，在運動的過程中，連多抽了幾支香煙，多用了幾張信紙也被視為貪污。至於「五反」運動，資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幾乎是人人過關，個個挨整。這種狀況，同樣也不是運動執行者的「過火」，而是得到毛澤東親自肯定的既定方針^{④⑥}。一個當年的打虎隊員說：「我們那時候的工作方針就是『撒大網』、釣大魚，先全部撈上來，再挨個的過篩，也就是說我們把所有的和經濟貼邊的人，全部打成老虎，再審查。」^{④⑦}在運動中，由於群眾鬥爭的「火爆」，導致自殺的情況幾乎無地無之。在蘇州，一個區委書記在一個茶葉加工廠領導「五反」，一上手就使用肉刑，逼得一家六口自殺^{④⑧}。浙江大學在運動期間，對面的市民醫院救護車每天出動數次，教職員工自殺者時有所聞。連蘇步青、蔡邦華這樣的著名學者，也被整得七死八活，幾次檢查過不了關^{④⑨}。

運動從開始就在過火的程度上運行，直到收尾糾偏時，被定罪的人中，有相當部分不是被冤枉的，就是罪與罰不相稱。如經濟落後的蘇北地區僅僅十天，就查出貪污份子1,557人，佔全體參加「三反」學習的人數22%，但真正稱得上是貪污犯的，僅佔打出的「老虎」中的千分之一。一個當年的打虎隊員說：我們那時候的工作方針就是把所有的和經濟貼邊的人，全部打成老虎，再審查。

殺雞取卵的打土豪方式，不僅使運動初衷之一的改善財政狀況無從實現，反而造成了巨大的財政損失。這一切，顯然是一個新生的還沒有恢復元氣的政權所無法承受的。華北第一大商埠天津，自「三反」以來，商業批發減少一半，運輸減少四成，銀根緊，市場交易不暢，糧食成交下降達一半，生產下降，稅收減少三、四成^④。天津市委在給中央的報告裏訴苦道：「一部分直接受到影響的勞動人民已在叫苦。如不採取措施，經濟上的萎縮現象還要發展，時間過長，則元氣損傷過大。」^⑤重慶一些工廠商店歇業停工，鋼鐵、機器、建築、捲煙、針織等業目前均極度困難，生產停頓，已有兩萬工人失業^⑥。西南局書記鄧小平給中共中央發來了措辭嚴厲的電報，說是重慶很多市民已經到了無食缺食的地步，開始對「三反五反」運動表示不滿^⑦。上海「三反」以來，失業工人增至十三萬人，比1950年初遭到國民黨飛機轟炸，經濟形勢最糟時還要多^⑧。事實上，直到1952年底，因運動導致的經濟形勢惡化尚未好轉。毛澤東在一份調整商業的中央指示稿上，還有有關公私關係緊張，失業增加，致使中小工商業者和攤販對中共不滿的批語^⑨。打貪污得到退賠和「五反」得到的退補，還不夠堵運動造成的窟窿。國家的開支，戰爭的費用，以及千百萬城市居民的吃飯，所有的一切都是執政的共產黨人所必須承擔的。到了這個時候，毛澤東也許意識到了自己已經成了一個大國的當家人，不再是當年的造反者，所以，一場大張旗鼓、雷厲風行的運動也只能迅速收縮，草草結束。

儘管如此，運動並不是一無所獲，運動的結果雖然跟發動者的預期有距離，但至少在當時看來，還是向預期目標靠攏了。對於治理很有意義的是，經過運動，原來興盛的「機關生產」大體瓦解，各個「山頭」的家當（當時稱「家務」）都歸了中央財政。中共原來在戰爭狀態下，各個山頭分立，各顯神通搞經濟，或多或少形成了「山頭主義」、分散主義的局面。這種局面經過中共建國前後的這種措施，已經逐步減弱，到了取消機關生產這一步，山頭進一步被削平了。同時，經過運動，中共還部分地解決了建國初大量的留用人員問題，將這些有「舊社會污毒」的人，以最正當的藉口逐出各個機關，尤其是公安機關。

至於毛澤東特別在乎的執政黨腐敗問題，經過運動，至少在某些層級上得到了較大程度的遏制，進一步促進了整個社會，尤其是黨內部分人的簡樸節約風氣。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全國上下，除了滿足人基本需要的衣食之外，任何一點多餘的裝飾品都可能被視為資產階級思想的體現，禁欲主義的道德至少在中下層，確立了絕對的統治地位。

藉反擊「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來遏制中共黨內的腐敗，實際上是一種打擊資產階級的主動出擊，一種治自己的病在人家身上開刀的療法。這種打擊，不僅削弱了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更重要的是將這個階層搞臭了，使他們在傳統意義的信用和道義上破產。在運動中，被抓住的資產階級「小辮子」，被中共視為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本性，而且「不法資產階級份子」是「目前承襲並且支持這些污毒的主要的社會階級基礎」^⑩。所以運動過後，雖然中共放了工商業者一馬，沒有斬盡殺絕，但已經從政治和道德上公開判處了他們的死刑。「五反」過後，工商業者普遍處境艱難，蘇南地區私營公司的信用受到懷疑，人們擔心它們的產品是否「貨真價實」。資本家生產積極性不高，有關單位不得不採取威脅改變他們的「類別」（即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嚴重違法、完全違法五等

經過運動，原來興盛的「機關生產」大體瓦解，各個「山頭」的家當都歸了中央財政。中共還部分地解決了建國初大量的留用人員問題，將這些有「舊社會污毒」的人，以最正當的藉口逐出各個機關。至於毛澤東特別在乎的執政黨腐敗問題，經過運動，也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遏制。

類別)的方法來迫使他們開工⁵⁶。有的店廠，工人勞動紀律鬆弛，但工資卻要拿最高的。「五反」後試行的工人監督生產制度，「在大的私營企業裏成立了增產節約委員會，建立了工人對生產的監督，從此，資本家的『三權』(人事調配權、經營管理權、利潤分配權)受到了限制，變成了『三靠』，即資金靠銀行，原料靠國營，生產靠工人。」⁵⁷這等於是中共借工人監督之手，進一步控制了私營資本。泰韋斯(Frederick Teiwes)甚至認為，運動不僅導致了國家對私營資本的控制加強，還產生了更加忠於黨的新的城市精英⁵⁸。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工商業者心萌退志，大家都明白，眼下的放一馬，不過是暫時利用而已。大家明顯感覺到中共原來承諾的新民主主義的過渡時期，已經靠不住了。有些資本家認為，今後只有公私合營一途了，甚至打算立即放棄資產，變成無產階級(他們表現進步的子女也起了很大的作用)⁵⁹。從某種意義上說，「三反五反」運動為日後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在政治上鋪平了道路，在客觀上使得中共改變原本預定五十年的過渡期，加快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建國後一直從事統戰工作的李維漢就明確地說：「這場鬥爭(指『三反五反』，筆者註)的偉大勝利，為資本主義工商業進一步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和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奠定了基礎。」⁶⁰1956年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中也說道：「1952年的三反五反的鬥爭，開始造成了我們國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局面。」實際上，經過運動，毛澤東解決困境的思路已經很明晰了，那就是，用迅速消滅私營經濟的辦法，切斷執政黨的腐敗之源，從而避免在社會主義到來之前，革命黨喪失自己的道德基礎和革命精神。

當然，解決問題還有另外一種思路，那就是改革革命黨的性質，黨退出對經濟直接管理，走民主化的道路，靠權力結構性的制衡和輿論的監督，解決轉型政權的腐敗問題。顯然，當時的中共是不可能這種思路的。薄一波在1952年7月總結「三反五反」運動的報告上說：「這次運動所要回答的問題，是我們的國家究竟是要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要走向資本主義這樣根本性質的問題。」毛澤東也說，如果不把資產階級「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會上的人都要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⁶¹。在冷戰的格局下，第二種思路勢必被看成大逆不道的資本主義路線，不僅不能考慮，而且要加以批判。然而，後來的歲月告訴我們，在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的改造、完全公有化之後，毛澤東發現1951年底困擾他的問題並沒有真的解決，雖然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有權力鬥爭的因素，但革命黨道德的困境，對革命精神喪失的擔憂，也不能說不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從某種意義上說，文革也可以說是一場大規模的「三反」，屬於一場道德清潔運動。由於毛不惜打碎自己的黨政系統，因此搞得特別徹底，也特別混亂，禁欲主義的道德推行也更加徹底，不留餘地，最後變成了一場真正的浩劫。

1956年毛澤東總結道：「1952年的三反五反的鬥爭，開始造成了我們國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局面。」經過運動，毛澤東解決困境的思路已經很明晰了，那就是，用迅速消滅私營經濟的辦法，切斷執政黨的腐敗之源，從而避免在社會主義到來之前，革命黨喪失自己的道德基礎和革命精神。

五 簡單的結語

跟蘇俄的革命不同，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本質上是一場農民造反。因此，革命後的中共擁有自己特殊的問題，所謂李自成式「進城難局」，即如何在城市的條件下，保持原有的農民式的樸素道德團體氛圍。中共當時所面臨的問

題，實際上屬於制度變革的範疇。古今中外，歷史上造反者奪取政權，尤其是農民造反者成功，都面臨一個制度化建設的問題。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化過程，一般都依照前蘇聯的模式，靠建構龐大的國家官僚機器和完備的計劃，管理國家和進行生產，實現國家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技術化。這樣的結果，雖然國家政治也能步入正常軌道，但必定要犧牲掉革命黨固有的道德與革命精神。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以列寧主義方式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奪取政權之後，由「黨」變成「黨國」，即黨和政權系統結合起來，勢必要發生某種蛻變。這個蛻變，其實主要不是階級成分的變化，而是黨的行政機關化，變成了像前蘇聯式的官僚集權體制。應該說，以俄為師的中國共產黨人，並不是沒有這種蘇聯式的國家制度建設和相應的官僚化過程，但是，這個過程進行得並不順利，沒幾年就開始強調中國特色。中共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一直對道德主義路線情有獨鍾，總是喜歡以不停頓的道德整肅，來維持革命精神和保持道德原色。在他看來，這才是革命黨的優勢所在。顯然，毛澤東不希望看到，在國家的制度化建設中損耗掉革命黨的精神。斯大林也搞黨的內部整肅，但主要是為了清除政敵（儘管有些政敵屬於幻想出來的），而且手段也不採用群眾政治運動的方式。毛澤東則不然，他的內部整肅，至少有一半以上屬於道德清潔或者是思想整肅。整肅往往以開放的運動方式進行，直接訴諸群眾，要求參加者實現自我道德完善和修補，實際上屬於集體的道德自省。顯然，這是傳統理學的某些因素的泛化。在毛澤東看來，掌握政權之後，黨也必須保持革命精神，維繫革命道德，否則在資本主義面前，就失去了力量優勢。要保持革命精神，必須借助群眾的參與，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集體的道德自省，才能完成這一過程。在西方政治學視野中，群眾是個跟「暴眾」有關、意義多少有些曖昧的概念，而在毛澤東那裏，同樣的詞彙，卻是人人可以為堯舜，具有巨大的能動性的力量之源。就像傳統中國的聖人之道，所謂「禮失求諸野」一樣，黨的道德缺損，也需要借助群眾來彌補。當然，這種群眾政治運動進行多了，無論幹部還是群眾都有不勝其擾的感覺，但是，在制度化不完備的國度裏，有時，運動確實有助於政治任務的完成。久而久之，搞運動成了某種新的傳統，具有不可抗拒的慣性，不搞就無所措手足，這就是為甚麼在後毛澤東時代，儘管明令宣布不搞運動，但運動的陰魂卻依然不散緣故。

毛澤東的內部整肅，至少有一半以上屬於道德清潔或者是思想整肅。整肅往往以開放的運動方式進行，直接斥諸群眾，要求參加者實現自我的道德完善和修補，實際上屬於集體的道德自省。在制度化不完備的國度裏，有時，運動確實有助於政治任務的完成。久而久之，搞運動成了某種新的傳統，這就是為甚麼在後毛澤東時代，儘管明令宣布不搞運動，但運動的陰魂卻依然不散緣故。

註釋

- ① 參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第七章第二節。
- ② 許蕾：〈政治運動的動員機制——以「三反」運動為個案〉，《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第一、二部分。
- ③④⑤⑥⑦⑧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498；570；524；535；651；646。
- ⑦ 上海清算出十萬億「違法所得」數，超過了資本家1951年全年的實際所得。後來不得不大幅度地降下來。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頁439。薄一波在回憶錄裏也提到，蚌埠有150家工商戶，資本只有15,000億元，要退補的就達三萬億元。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177。
- ⑧⑨⑩⑪⑫⑬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142；147；174；144-45；145、165-66。

- ⑨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147。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裏也有敘述此事，不過，那裏說毛派專人給中南軍區負責人譚政送的是一封信。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209-10。
- ⑩ 1952年1月4日和6日，毛澤東曾經在薄一波的一份報告上批覆說：「各地如有需要殺幾個貪污犯才有利於發動群眾，亦可殺幾個。」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頁19。
-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頁411；197；95；64；94；30；134；184-85；169；195；64；197；52；214；610-11；412。
- ⑫ 李新：〈人民大學「三反」記〉，《百年潮》，1998年第1期，頁50-53。
- ⑬ 1952年1月8日公安部報告，轉引自許蕾：〈政治運動的動員機制——以「三反」運動為個案〉，頁50。
- ⑭ 新華社：《內部參考》，1952年1月25日，1952年2月1日。
- ⑮ 比如陝西省長安縣，由於靠近西安，部分村莊農民聽說「三反」消息後就自發進行「三反」運動。參見新華社：《內部參考》，1952年2月20日。
- ⑯ 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頁27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171。
- ⑰ 這個提法，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中，都沒有查到，但在某些地方「三反」史料中，有這樣記載。參見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江蘇省檔案館編：《「三反」、「五反」運動·江蘇卷》(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3)，頁131-32。
- ⑱ 毛澤東1952年1月21日在薄一波的一份報告上批道：對一些對革命有功、偶然失足情節甚輕者，可以免於處分。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頁74。
- ⑳ 周而復：《往事回首錄——雄雞一聲天下白》(北京：工人出版社，2004)，頁87。
- ㉑ 肉刑的花樣非常多，吊打、杠子壓甚麼都用，瀋陽有的機關「把老虎放在燒得紅紅的火爐旁邊烤」，一邊拿着紙逼着老虎，連叫「寫！寫！寫！」(新華社：《內部參考》，1952年3月1日)。上海文化局機關連續三天三夜不讓鬥爭對象睡覺，直到他們昏過去(新華社：《內部參考》，1952年2月18日)。南京一個洗澡堂的老闆娘被店員工人鬥了五天五夜，剝光了衣服，跪在放滿了雪的澡盆裏，頭上還要放一個雪團(新華社：《內部參考》，1952年3月18日)。
- ㉒㉓ 楊漢基口述(74歲，離休幹部，現居山東威海)。曹楠整理。
- ㉔ 新華社：《內部參考》，1952年3月18日。
- ㉕㉖㉗㉘ 《「三反」、「五反」運動·江蘇卷》，頁176；288-89；176；96；121-22。
- ㉙ 新華社：《內部參考》，1952年2月7日，1952年3月3日。
- ㉚ 新華社：《內部參考》，1952年2月21日。
- ㉛ 華東局1952年3月9日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上，提出要在「五反」中「使所有資本家無例外地在工人面前過一次關」。報告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認為這個報告很好。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頁350-51。
- ㉜ 宋雲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頁273、275。
- ㉝ 新華社：《內部參考》，1952年2月15日。
- ㉞ 新華社：《內部參考》，1952年2月22日。
- ㉟ 《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227。
- ㊱ 新華社：《內部參考》，1952年3月19日。
- ㊲㊳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727；727-28。
- ㊴ 參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編，王建朗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92-93。
- ㊵ 《「三反」、「五反」運動·江蘇卷》，頁239；新華社：《內部參考》，1952年4月23日。